

台灣經濟轉型的大功臣俞鴻鈞

● 王作榮（前監察院長，現任總統府資政）

面對不可為而為之

故行政院院長、財政部長、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先生，是我服公職的第一位最高長官。我於一九四三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經濟系，隨即進入財政部專賣司工作，時財政部長為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先生兼任，孔部長尚兼任中央銀行總裁，可說總攬財金大權，不到部辦公，在范莊官邸批閱公文及作指示。俞先生為政務次長，負責財政部實際責任，不但處理財政部一切事務，所有重大決策及措施均由俞先生事先商酌、研究及協調後，提出具體意見及建議，赴范莊請示孔部長作裁決，而孔部長的裁決即是行政院的裁決，因行政院長蔣中正委員長不過問財政施政，由副院長全權處理也。故俞先生為實質上的財政部長

，也是我的實質上的最高長官。

中央政府遷台後，我於一九五三年進

入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下設工業委員會工作，名義為專門委員，負責經濟研究、設計及政策建議，時俞先生為經安會的主任委員，這是第二次成為我的最高長官。雖然二次都因職位懸殊，不能親身接受其領導教誨，但因我的專業背景及愛觀察分析的個性，對俞先生的施政方向、決策能力、領導風格，及個人操守等等，仍有深刻印象。俞先生係於一九四一年出任財政部政務次長，曾一度代理部務。於一九四四年真除財政部長，一九四八年轉任中央銀行總裁。總計主掌國家財政大權達七年之久。而這一段期間正是國家處境最艱難，財政因應最窘迫的時期，俞先生進入財政部工作時，抗戰已經歷四年，所有對外

通商口岸及重要工商業城市全部淪陷敵手，所有現代化的工商貿易稅源可說全部截斷，而進步國家盛行的所得稅制則尚在發軔階段。政府主要財政收入只有靠田賦、專賣利益、部分貨物稅，及國內外公債。這些絕大部分都不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正常財源，收入有限，可想而知。而另一方面，則經常要維持三百萬以上的作戰部隊及與此相稱的後勤人員的運作，以及因應戰爭需要而日益龐大的政府組織及人員之所需，其收支差距之巨大，籌措之困難，不是簡單的「財政赤字」四個字所能表達出來的。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，繼之以戡亂，光復地區稅源未復，而戰爭與復原建設所需經費更大，財政赤字更為嚴重。面對這種可以說是不可為的局面，俞先生苦撐達七年之久，其身心所受之煎熬，實非常

人所能想像，而俞先生以其一貫之穩健務實、埋頭苦幹的風格，與一面支應現局，一面興利除弊，達成開源節流，以縮小赤字差距的施政方針，不斷的克服難關，也不斷的度過難關。至抗戰勝利，通貨膨脹仍在嚴密控制之中，而無論抗戰與復原工作，均不會因財政失調而受到挫折。這豈是一些太平盛世的財政部長所能做到的。

穩健務實埋頭苦幹

另一方面，俞先生並未因財政上的困難而罔顧民命，竭澤而漁。仍然培養稅源，厚植民力，俾在不斷增加財政收入之際，民間仍能維持起碼的生活。而對於非作戰的公教人員收入雖極微薄，在實施一定程度的配合制度之外，也能勉維溫飽，與其他原先富裕進步的參戰國家水準相當。所以在整個抗戰期間及復原初期，雖然八年苦戰，民空財盡，但社會安定，民心誠服，通貨膨脹亦在控制之中，與世界其他國家比毫不遜色。我於一九四九年來台，得知戰時乃至戰後初期台灣人民及本省籍公務人員生活之艱苦，甚至有長年在饑餓中以番薯維生而不可得者，其境遇實遠不如戰時我國大陸之情形。儘管在如此艱苦

情況下，財政人員貪汙之風雖時有所聞，但多屬偶發事件，並未成為風氣，可說百分之九十以上財政人員均屬清廉，並以貪汙為恥，而且都維持高工作效率。我亦為財政人員之一員，深知其事。這與當前台灣政風相比，貪汙成風，且不以為恥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，令人感慨。

所有這種情形，當然與當時一般民心士氣及人民品質有關，也是全民共同努力的結果。但作為國家財政掌舵人的俞先生，決策正確，行政能力強，領導有方，應是最重要的因素。現在時隔五十餘年，經濟學者及歷史學家回顧這一段時間的歷史，常以政府貪汙無法，通貨膨脹嚴重，便抹殺當時國家領導人，特別是財政領導人瀝盡心血，夙夜匪懈，為國家前途奮戰，挽救國家於危亡所作的犧牲奉獻，實在太不公平。在此紀念俞先生一百零二歲冥誕之時，我以一个當時的財政人員與經濟學者出身，而身歷其境者，回顧那一段艱苦歲月，不禁淒然，世間那有公理。一九四九年初，政府已決定以台灣為最後根據地，乃由俞先生以中央銀行總裁，再以個人影響力分兩次將庫存於中央銀行之黃金搬運來台。此筆黃金以後一部分成為新金融

改革措施，發行新台幣的主要準備金，使台灣金融得以穩定，惡性通貨膨脹得以控制，方始展開以後之經濟建設與發展；另一部分則用於補貼財政，進口軍需民用物品上，亦為經濟穩定力量之一。假如沒有這筆黃金，則通貨膨脹勢必更形嚴重，而時間亦必更為延長，經濟發展亦必大幅延後而台灣人民生活的困苦亦必加深加劇。

宰相風範舉足輕重

一九五〇年，俞先生三度出任中央銀行總裁，但當時央行並未復業，責任不重，不過仍時受層峰的顧問，並為當時財金界請益的對象，仍是舉足輕重的人物。一九五三年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，本其一貫的穩健務實作風，解決糧荒，建立制度，整頓人事，確立政策，雖其職掌不過一省，但儼然有宰相風範，為以後出任行政院長奠定基礎。任內重大措施甚多，有兩點對國家前途影響深遠，值得特別提出。(一)實施從安定中求進步，從進步中求安定的政策，不躁進，不退縮，穩定與進步兼顧。此一政策為日後歷任首揆所遵循，終使國家在安定中走上發展繁榮之路，以有今日的局面。(二)建議在行政院下設立經濟安

定委員會，以省主席兼任主任委員，這看似閒棋一著，無關緊要，其實不然。當時財政大權不在中央而在省政府，中央政府有點寄人籬下的情況，自然不成體制。但驟然移轉過來，亦為當時情勢所不許。乃設立經濟安定委員會，由中央與省府重要官員組成，並有美援美方人士參加，其職掌包括工業、農業、外匯貿易、財政、金融、美援，所有經濟事項無所不包，經過幾年運作之後，至一九五八年裁撤，業務自然移轉至中央各有關機關，於是財政大權始在無形中轉至中央政府，使國家體制恢復正常。這一點很少有人認知。

一九五四年六月，俞先生實至名歸，終於出任行政院長，成為憲法上規定之全國最高行政首長，總攬國政。其時政局雖稍趨安定，國家前途看好，但通貨膨脹仍有餘威，常有突發性物價上漲，經濟管制仍在嚴格執行，而經濟發展落後，人民生活改善有限，財政及經濟建設仍有賴美援支持，經濟自主尚待努力。在此種情形之下，國家施政自以經濟發展為急務，而快速經濟發展首要條件必須逐步解除經濟管制，釋放民間活力，同時建立各種制度，俾經濟活動能在現代制度中運行。財政方

面，則加強稅收，建立新稅制，控制政府組織及人員，摶節開支，務求縮小財政赤字，維持經濟穩定。整個經濟施政原則仍是在安定中求進步，在進步中求安定，仍不脫俞先生施政風格——穩健務實。由於這種務實作風及高行政效率，終於在俞先生任內，完成台灣經濟的第一次大轉型，徹底擺脫了戰時經濟的後遺症，包括惡性通貨膨脹及嚴格經濟管制在內，導引台灣經濟恢復正常軌道上運行，並進一步加速前進，走向現代化之路。台灣經濟至一九五六年，通貨膨脹即完全在控制之中，長期經濟穩定已經達成，此後所當致力者唯有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，使台灣經濟起飛

，轉型為一現代經濟體，在擺脫美援，經濟能自主下大幅提高人民所得及改善人民生活。所有這些目標均包含在自一九五七年起的第二十四年經濟設計畫中。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俞先生辭去行政院長止，台灣經濟起飛條件業經完全具備，並已開始起飛，從此開啓以後數十年的高度成長，高度穩定，形成台灣經濟奇蹟，以有今日的台灣經濟成就，並因此成就而使台灣屹立於國際社會。我們今日享受這種成果，早已忘記諸先賢當年的流血流汗，竭智盡

忠，為國家為人民所作的努力，所奠立的深厚基礎，以為台灣本來就是如此令人慨然。而在諸先賢中俞先生是領導人之一。

開啓經濟起飛之門

俞先生卸任行政院長假如有什麼問題留下未曾解決的話，那就是因此後的經濟轉型與快速發展，所衍生的問題，諸如農業發展落後問題、城鄉所得差距問題、基本建設問題等等。但這些都是伴隨經濟快速發展所必然要發生的問題，其解決便是繼任者的責任了。我們評論俞先生一生對國家的貢獻，總是說他在大陸淪陷時運黃金來台，功勞最大，即使是當時層峰亦不免於這種想法。其實，這不過是技術性的小事。俞先生作為國之大臣，他的貢獻應是決定政策與嚴格監督政策的推行。從這一方面來看，俞先生在大陸時期，他的貢獻在於管理戰時財政；在台灣時期，他的貢獻在於經濟穩定與經濟發展，尤其是在他手上，完成了台灣經濟的第一次大轉型：結束了台灣戰時及非常時期經濟體制，開啓了經濟起飛及經濟奇蹟之門。相信後代的歷史學家會對這些給予俞先生公正翔實的記載與評價。